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22期）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1年3月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 22 期）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

报告人：刘青

2021年3月3日

提纲

I. 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逻辑：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

II. 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形成1-2年窗口期；国内分裂，中期选举

III. 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国内为主、由易到难；美国会优先解决更容易的盟友之间的贸易冲突、改造复活国际机构；美国会努力重塑TPP（TTIP, EPA），但困难重重；会努力破坏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如加入CPTPP；优先技术而非贸易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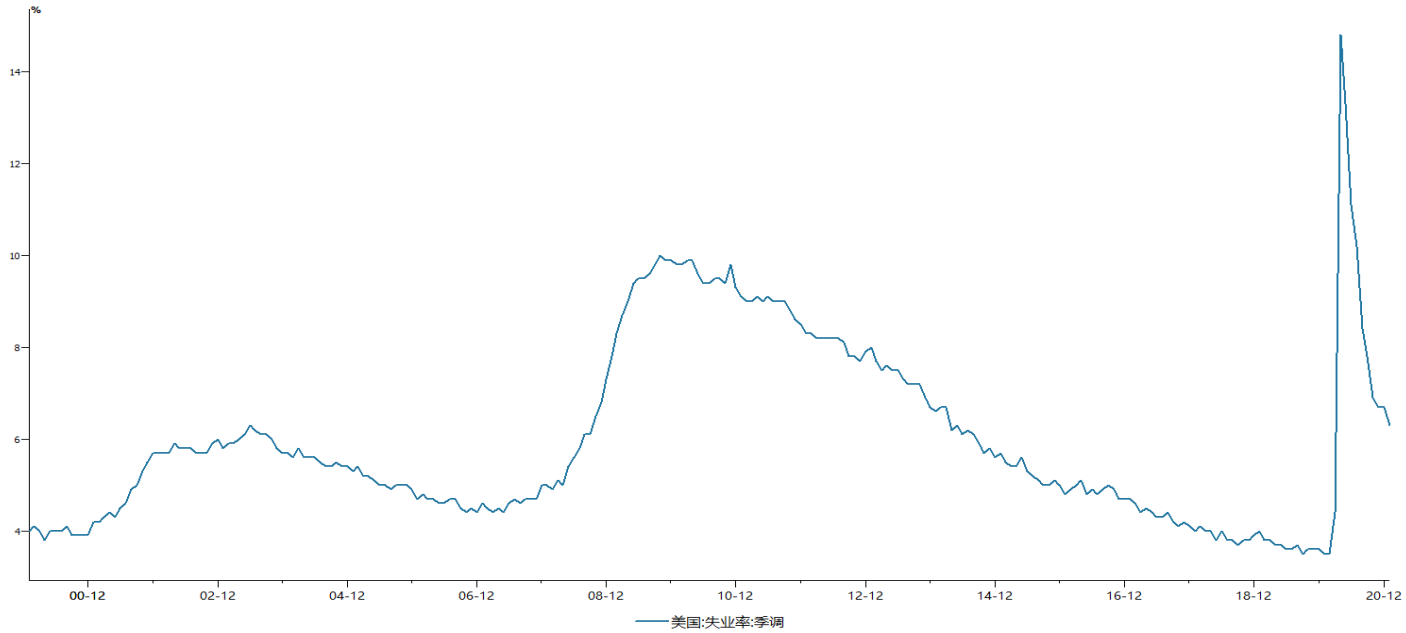
IV. 中国需要善用市场规模优势、加快改革开放，利用窗口期取得先机，在有的放矢对冲美国攻势中前进

I. 美国行为逻辑

中美贸易战：分析起点——理论与事实

1. 美国所声称的贸易逆差与失业问题均不是事实

- 美国关于贸易的观点：
  - Lose money: 贸易逆差
  - Lose jobs/Inequality: 工人受损
- 美国经济事实:
  - 很小的贸易赤字率: -2.4% in 2018
  - 很低的失业率: 3.9% in 2018, 3.5% (201910), lowest in past 50 years.


%
14
12
10
8
6
4
00-12
02-12
04-12
06-12
08-12
10-12
12-12
14-12
16-12
18-12
20-12
美国:失业率:季调

I. 美国行为逻辑

中美贸易战：分析起点——理论与事实

2. 贸易战无法解决贸易赤字与失业问题是学界共识

- 经济学理论:
  - ***净储蓄 = 政府预算赤字 + 贸易盈余***
  - 美元储备货币
  -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SBTC): 85% of unemployment; irresistible
  - 2008金融危机对社会底层冲击更大：收入分配
  - 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以及全球的产业链组织结构决定的, eg iPhone.

- The trade war is not really a “trade” war: common knowledge to both sides.

I. 美国行为逻辑

中美贸易战：分析起点——理论与事实

3.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意愿由来已久

- 美国升级与中国的贸易冲突：长期趋势
  - 国际政治经济竞争
  - 小布什“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特朗普“战略竞争对手”
  - 本质一脉相承；形式丛林法则
- **为何此时？**
  - **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形势、国际形势好（无重大威胁），而非相反**
  - 美国核心优势面临紧迫竞争：高科技、美元
    - 中国高科技产业（AI、5G领先？产业政策？）
    - 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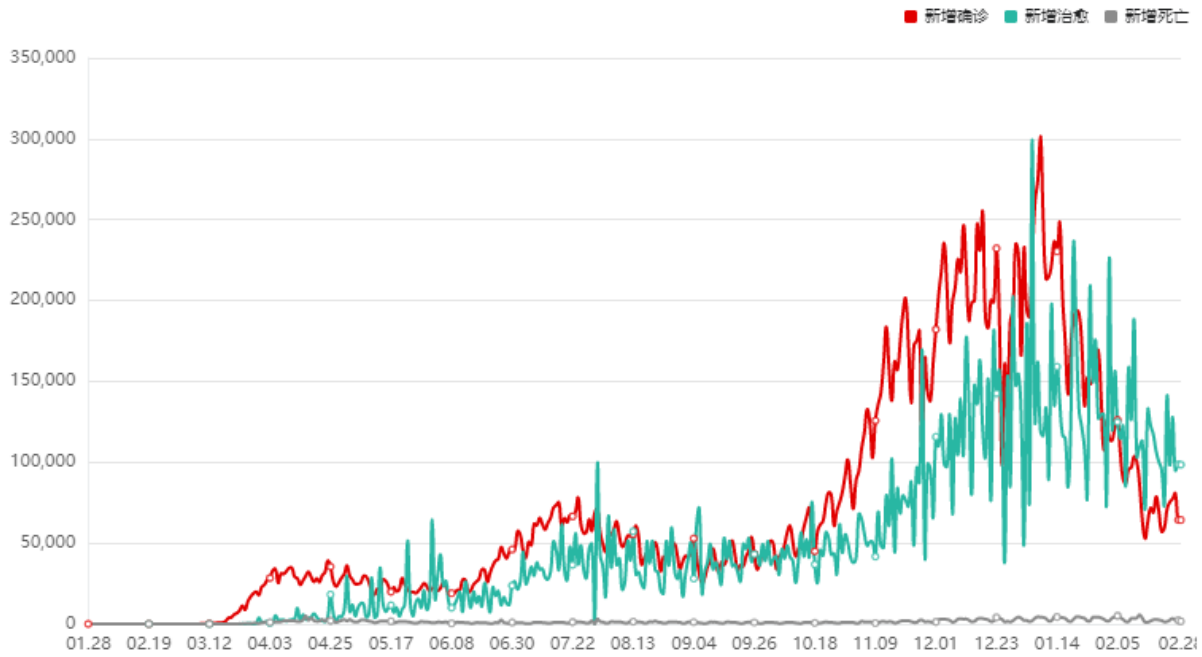
4. **意愿+能力（时机）：美国对华发起挑战的时机选择，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之时**

II. 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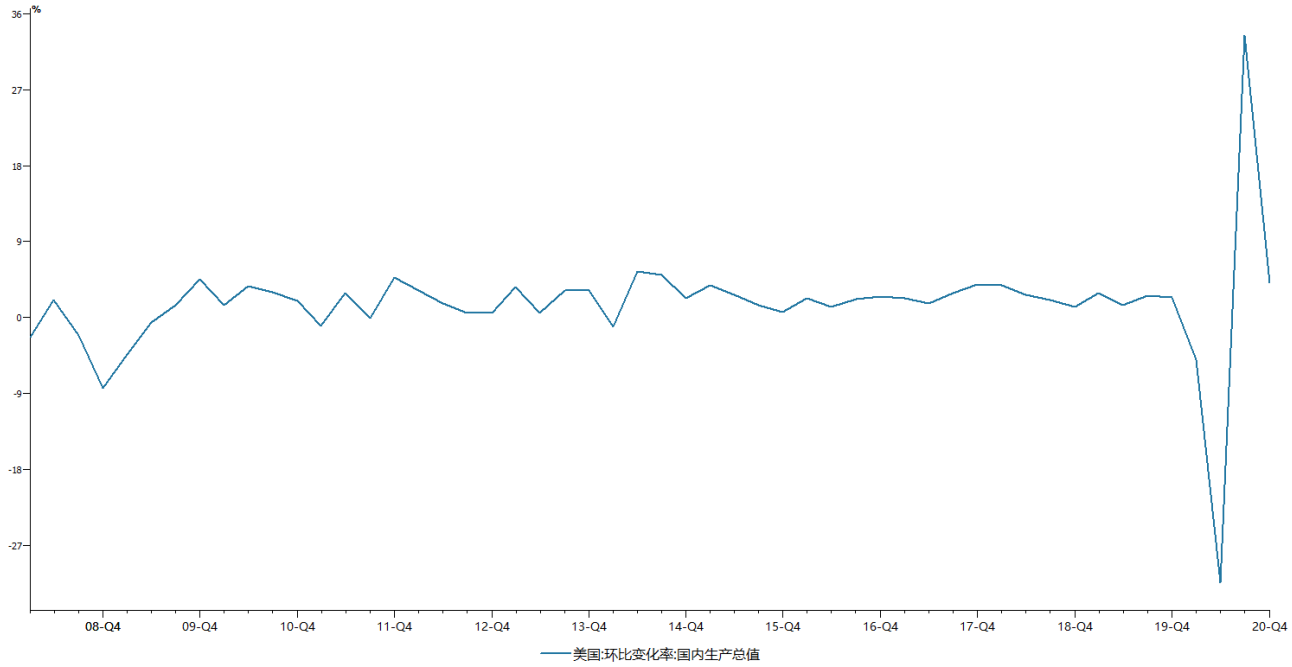
1. 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意愿没变

2. 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及疫后经济趋势需要认真研判：当前极差，但可能迅速反弹
   - 失业率高企达6.7%；贸易逆差创金融危机后新高；国债水平创历史新高；全年经济萎缩3.5%
   - 短期取决于对疫情判断：乐观预计今年疫苗基本接种完毕
   - 随着疫情缓和，经济今年可能触底回升
     - 中国经验：-6.8%，3.2%，4.9%，6.5%
     - 美国GDP年率、ISM制造业指数、ISM非制造业指数：美国疫情在二季度相对一季度稍有缓和，第三季度美国GDP增长率、ISM制造业指数以及ISM非制造业指数便均出现明显反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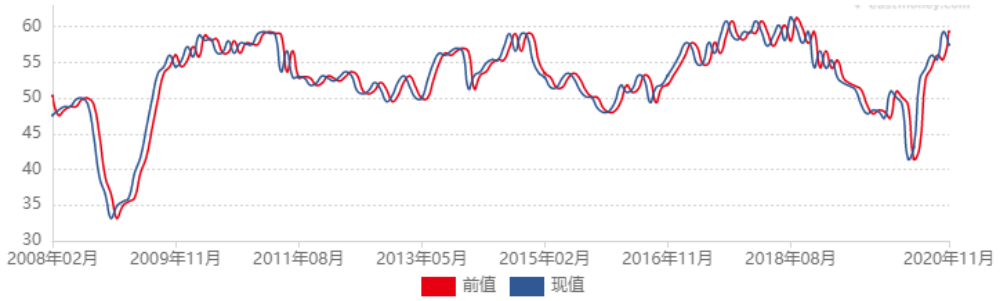
美国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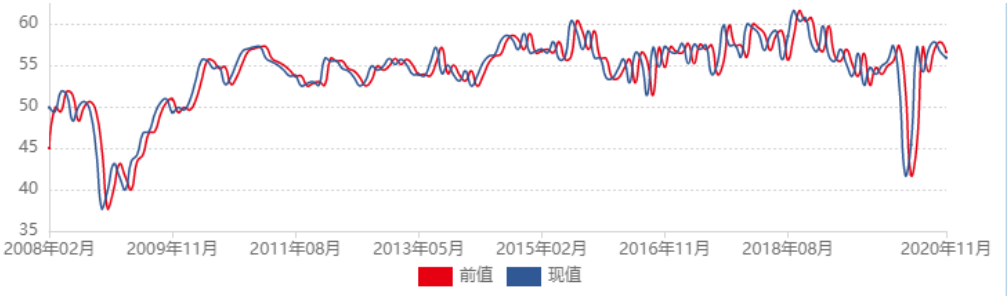

新增确诊
新增治愈
新增死亡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0
01.28
02.19
03.12
04.03
04.25
05.17
06.08
06.30
07.22
08.13
09.04
09.26
10.18
11.09
12.01
12.23
01.14
02.05

美国季度GDP增长率


%
36
27
18
9
0
-9
-18
-27
08-Q4
09-Q4
10-Q4
11-Q4
12-Q4
13-Q4
14-Q4
15-Q4
16-Q4
17-Q4
18-Q4
19-Q4
20-Q4
美国:环比变化率:国内生产总值

美国ISM制造业指数、ISM非制造业指数





II. 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3. 中国有1-2年窗口期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相对于Trump时期，挑战暂缓
   - 美国经济能力差
   - 国内议题约束：抗疫；重启经济；弥合分裂
   - 美国自身发展利益（贸易战有代价）
   - 寻求中国国际合作的需求

III.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 跳出经贸政策看经贸政策：整体视野，有取有舍

- 在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根本目标方面与特朗普政府无异
- 在重返多边主义、重视规则、联络盟友的基本政策手段方面与奥巴马等传统建制派政府无异
- 唯一的根本变化在于倡导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明确以小圈子“合纵”方式有组织地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
- 这一政策说明拜登政府本质上抛弃了美国在现有国际组织体系、国际规则体系内处理对华关系的传统立场

III.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1. 美国领导力存疑，其结盟制华策略不会一呼百应。
   - 美国目标：（在美国领导力有限的条件下）恢复美国的领导力，领导西方共同应对中国
   - Trump之后，实力受限、国内分裂、政治不确定性高企，是否还存在“美国领导力”？
   - 但拜登建制派的声誉，会是一个有利因素，是值得重视的一点

2. 拜登政府有对华合作需求，如气候问题、伊朗问题、疫情问题等，尤其是国内经济恢复议题
   - 逐一梳理识别这些合作领域，提前准备，确定合作与斗争策略，做好交易计划、整体规划

3. 拜登可能选择人权、意识形态等比较soft的方面强硬挑战，但不足为虑
   - 一方面符合其建制派偏好，另一方面难度低、美国代价小
   - 不会比Trump更强硬，例如意识形态上Trump已经挑战底线，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 因此短期不构成立竿见影挑战

III.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4. 对华经贸政策会延续特朗普时期重点（竞选政纲），区别在于相对更重视多边主义、规则与法律、与盟友合作

贸易	**1. 认为中国正在违反国际贸易规则，不公平地补贴、歧视美国公司以及窃取知识产权； 2. 呼吁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并建立盟友的统一战线； 3. 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以及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4. 暂不取消关税**
科技	1. 警惕中国在高技术方面超越美国； 2. 制定规则、规范和制度，团结盟友，以管理5G等高技术的全球使用；
地缘	1. 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 2. 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 3. 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深化与欧盟、澳大利亚、印尼、日本和韩国关系
国际组织与规则	1. 气候、环境、核武器等问题上，中美有合作可能。 2. 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WHO等
国际舆论	坚持要求中国政府提高透明度

III.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5. 重重限制下，经贸议程会由易到难
   - 国内议程横亘于前：打倒Trump；控制疫情（**此前，对华最优策略是特规拜随**）
   - 优先平息美国挑起的盟友间的贸易冲突
   - 改造、逐步恢复WTO等国际机构
   - 破坏中国的国际经贸合作努力：加入CPTPP, 中欧CAI等
   - 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产业政策、**科技**等领域施压中国：Trump留下很多武器
   - 努力重塑或重启TPP、TTIP谈判，但困难重重
     - 国内疫情
     - 社会分裂：反全球化氛围
     - 政党分裂，Trump掣肘
     - 贸易协定议题优先度不高
     - TPP高标准需要再谈判：22条
     - 日本与美国利益的一致与矛盾：利用美国制衡中国；有限独立的大国抱负

III. 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

6. 美国与盟友协调应对中国的核心，可能不在于贸易，而在科技
   - 与中国贸易仍然是符合其利益的
   - 科技革命关键时点，科技才是核心竞争冲击，美国与盟友也有优势
   - 可能更具破坏性、攻击性
   - 政策导向：“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
7. 拜登“以劳工为中心”的经贸政策与对华关税的两难
   - “以劳工为中心”：保护就业；保护消费
   - 保护就业需要维持关税；虽然是短视政策（忽视了一般均衡效应）且效果不彰（美国制造业比例低、贸易转移效应），但符合政治需要，尤其在中期选举前
   - 保护消费需要取消关税，降低消费者价格
   - 权衡而言：科技产业关税可能维持；消费品关税可能逐步取消，中期选举是时间节点

IV. 中国应对策略

- 善用当前窗口期的市场规模优势，有的放矢对冲美国策略
  - 做好国内建设
  - 疫情结束后各国均有极大压力迅速恢复经济，谁能利用好中国市场谁就能率先复苏
  - 中国应该抓住疫情结束前后这段关键时期，利用好市场这个关键工具
  - 针对三个方面：美国、日本、欧盟

- 美国方面：
  - 让美国部分理性力量意识到疫后中国市场的价值，“离岸平衡”美国内部力量：华尔街、制造业、农业、旅游等可贸易品部门
  - 加强主动出击，塑造引导议程，复活中美BIT谈判
  - 中国可适当主动松动一些符合共同价值观的表态，主动改革开放，主动回应一些与中国利益一致的美国社会的普遍关切，例如知识产权、技术转移（鼓励市场化技术合作）、新闻及文化交流、人权等，让其打到棉花
  - 在不同领域的议题上进行交易，断绝美国“甘蔗两头甜”的幻想：例如，美国以“劳工为中心”的政策议题的实现，需要中国的配合

IV. 中国应对策略

- 日本方面及CPTPP：吸引日本及各国尽快谈定中国加入CPTPP事宜
  - CPTPP搁置的22项内容大多为美国所提出的高标准，美国要重返势必需要激活、重谈，否则达不到美国目的，其他成员国对此是否利益兼容？会否久拖不决？中国会有一段谈判窗口机会时期
  - 日本素有摆脱美国之意（只要有机会），若美国加入TPP，日本自然无地位，相反，若拖延美国加入、拉中国加入，则大利于日本自立之战略意图：美日产业竞争性强，中日互补性高，有利于日本产业发展及日本在亚洲产业链的有利地位
  - 在美国衰落（预期形成）之际，中国要认真研究日本的动向与策略，适度引诱日本走向独立，且自经济独立始
  - 同时暂时放下姿态谋求加入、让日本主导CPTPP，类似RCEP让东盟主导
  - 尽快推动RCEP落实生效，巩固亚洲产业链，紧密亚洲联系
- 欧盟方面
  - 让欧盟意识到疫后中国市场的价值，尽快落实CAI
  - 让欧盟意识到美国的不可靠性：经济不确定性，社会分裂，Trump2024
  - 胡萝卜加大棒：当前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打击正当其时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于线上举行。百度 APP、网易财经、WIND、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网、南都直播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政策：预期与建议”，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李迅雷、毛振华、张明、沈建光、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 CMF 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四方面内容来展开：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三、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

四、中国应对策略。

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首先要明确美国的基本行为逻辑是什么。我们认为美国对华发起挑战时机的选择并不是任性的，它的逻辑是在美国处境好的时候发起挑战，而不是在美国处境差的时候发起挑战，可以通过回顾历史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我们的逻辑起点。在上述逻辑的基础上我们要判断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前提是要判断拜登政府当前所面临的局面是怎样的。我们认为中美激烈竞争的底层基本面没有变化，政治竞争的意愿没有变化。疫情之下美国经济状况预计年底会触底回升，但会形成 1-2 年窗口期。美国国内分裂是美国国内目前的首要状况，拜登会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问题，这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基本局面判断。

在这两个逻辑基础上，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经贸政策做出判断，美国会以国内为主，由易到难。在经贸上会优先解决更容易处理的盟友间各种冲突，也会进一步改造和重塑一些国际机构，美国可能会重启 TPP 谈判，包括 TTIP，但我认为美国参与新的国际经贸协定的努力会困难重重。美国在自身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会努力破坏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对中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 CPTTP。同时，他们会重视科技上的

目标，而非贸易目标。那么中国如何应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尤其是在疫情冲击当口最重要的优势是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市场都对其恢复经济具有重要价值，都是我们的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的一点。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逻辑

美国所声称的贸易逆差与失业问题均不是事实。2018 年美国贸易赤字率已经低至-2.4%，贸易赤字并非很大的问题，2018 年美国失业率是 3.9%，也处于很低的水平。2019 年 10 月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 3.5%，是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贸易战无法解决贸易赤字与失业问题是学界共识。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净储蓄率=政府预算赤字+贸易盈余，国家的净储蓄要么借给本国政府，要么借给外国，借给外国就是贸易盈余。如果美国的净储蓄很低、政府的预算赤字又很高的话，那么贸易盈余就会很小，甚至是负值，形成贸易赤字，所以美国总体贸易赤字归根到底是内部失衡所导致的，并不是贸易本身所导致的。学界多年的研究表明，全世界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美国的失业问题更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学术界称之为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在解释失业问题上占到了 85%的比重。而中美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以及全球的产业链组织结构所决定的，iPhone 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两年的研究表明，贸易战对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和美国就业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并没有解决美国声称的问题，这说明解决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不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目的。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意愿由来已久，贸易冲突是趋势上的一个点。回顾历史来看，2001 年小布什甫一上台就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当时中美 GDP 之比是 12.66%，两国经济总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种战略竞争后来被“9.11 事件”所打断。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中上台要优先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到了第二个任期，经济转好，奥巴马政府马上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直到后来特朗普接手了形势大好的局面后，大张旗鼓地直接开展了战略竞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一脉相承的，唯一的区别是方式的变化，以前是所谓的文明的方式，而后来是丛林法则。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冲突会在这个时点变得如此激烈？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这个时间点恰好是美国国内形势、国际形势都好的时候，没有内忧外患，而非它所谓的美国经济受到了中国的损害。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美国的意愿和能力决定了它对华挑战的时机，这个时机不是美国处境差之时，而是美国处境好

之时。

二、拜登政府面临的局面

中美激烈竞争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拜登一直在用“激烈竞争”这样的措辞，这是特朗普都没有强调过的。从拜登政府在政治、外交、国防、财政、贸易上的一系列安排以及他们的政纲发言，都可以看出竞争意愿没有变化。

美国当前经济状况及疫后经济趋势需要认真研判：当前极差，但可能迅速反弹。美国失业率目前达到 6.7%，贸易逆差创下了金融危机后的新高，国债水平也创历史新高，2020 年全年经济萎缩 3.5%。如何看待美国今后的经济形势呢？这要取决于对疫情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病例迅速下降，拜登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接种疫苗等，随着疫情的缓和，美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很有可能触底反弹。从我们国家的经验来看，2020 年一季度疫情最严重，GDP 增速为-6.8%，二到四季度逐季回升反弹，分别是 3.2%、4.9%、6.5%，这种模式在美国的经济数据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旦疫情出现好转，美国 GDP 和制造业、非制造业指数很快就会出现反弹。如果疫情得到很好的控制，我们预期美国经济会迅速反弹。但由于已经造成的损害和政策负担，美国经济完全重回正轨需要一段时间。

基于此，我们判断中国有 1-2 年窗口期处于有利经济地位。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当前经济较差，但已经出现趋势性扭转，未来会逐渐摆脱疫情的限制和破坏。另一方面，美国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回到正轨需要时间。此外，在美国国内的议题方面，我们认为抗疫会是今年的主流，美国会把大量精力放在抗疫上，另外也要弥合社会分裂。美国自身也要寻求发展，贸易战是有代价的，在国内局面不好的时候，这种代价尤其沉重，而且美国自身也要寻求国际合作。所以总体来看，相比于此前，未来 1-2 年我们会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经济地位的窗口期。

三、对华政策及对华经贸议程

我们需要跳出经贸政策来看经贸政策，因为要有整体视野，一定要做出有取有舍的判断。

在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根本目标方面，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无异，这一再得到了拜登政府的确认，包括美国国务卿非常直接的说法，认为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在于它的实现方式。

在重返多边主义、重视规则、联络盟友的基本政策手段方面，拜登政府与奥巴马等传统建制派政府无异。唯一的差别在于拜登政府明确倡导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明确以小圈子合纵的方式有组织地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以前建制派政府也都会有圈子和盟友，但强调的都是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架构、国际规则体系内进行，但拜登政府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的合纵政策实际上抛弃了美国这一传统的立场，这是最根本的变化，会引发一系列的议题，在众多的议题中对于中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所谓的联络盟友的合纵政策，第二个是在科技方面。

关于美国的合纵政策。我们认为美国合纵的领导力是存疑的，在经贸政策方面它结盟制华的政策不会一呼百应，比如美国宣称要恢复其地位来领导西方国家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美国自己的限制条件，那就是美国的领导力已经非常有限。在特朗普之后，民粹主义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之前特朗普一系列的毁约、退出国际机构、破坏国际规则的行动导致美国的信誉受损，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受到了疫情冲击。美国国内的高度分裂给国际社会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大家都预期美国未来会有轮动，大家都会预期以后会不会再变，特朗普等人会不会再上台，现在所谓的联盟体系到底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大家存有疑问，那么意味着美国所谓的领导力是存疑的。在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下，欧洲和日本主权独立的欲望会不会加强，如果加强的话美国在经贸政策上结盟制华的策略可行性是不是就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决定了在结盟制华上，美国的领导力是有限的。当然，拜登是建制派，拥有建制派可信赖的声誉，这对他是很有利的，大家可能会认为拜登的做法更有说服力、更值得信赖，即便是有限的结盟成功也会对中国在经贸上造成显著的压力，这是关于美国合纵的基本的判断。

拜登政府本身也有一些对华合作的需求，包括气候问题、环境问题、伊朗问题、疫情问题，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的问题，这导致美国在对华经贸挑战上也会有取有舍。

拜登政府可能选择人权、意识形态等比较 soft 的方面强硬挑战，但短期来看不足为虑。一方面它选择这些方面符合建制派的偏好，更重要的是这些挑战的难度很小，美国的代价很小，容易实施。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拜登在这方面的挑战不会比特朗普更强硬，比如在意识形态上特朗普已经挑战到了底线，所以在这些方面的挑战短期内不会造成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拜登政府在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来绑架整个西方世界，以促进结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对华经贸政策会延续特朗普时期重点（竞选政纲），区别在于相对更重视多边主义、规则与法律、与盟友合作。拜登政府的政策基本围绕五个方面；贸易、科技、地缘、国际组织和规则、国际舆论，所有的目标方向其实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在于拜登政府更重视多边主义，更重视规则与法律以及与盟友的合作，比如它仍然在强调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实行不公平贸易，强调要反对技术转移，保护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没有太大区别，与特朗普政府一脉相承。

在重重限制下，拜登政府的经贸议程会选择由易到难，进行艰难的调整。一是美国国内议程横亘于前，拜登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施展，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潮流构成的限制，因为只要这个潮流存在，特朗普就拥有足够的影响力，拜登政府所做的任何一项决策都可能会受到攻击。二是控制疫情。三是中期选举。在中期选举之前，拜登政府在经贸议程上很难有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限制下，美国会优先选择平息美国挑起的盟友间的贸易冲突，一是比较容易，二是符合结盟的大思路框架。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和它的传统盟友的争议仍然存在，包括数字经济问题、大飞机问题、农业补贴问题等。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改造、逐步恢复 WTO 国际机构，这有利于宣扬美国重返国际社会的姿态，但在贸易方面即便美国恢复 WTO，WTO 也无法达到美国的目标，比如反补贴，因为 WTO 管辖不了。美国可能重启 TPP，以及美国与欧洲的 TTIP 等谈判，这对于美国的结盟是符合政策方向的，但是会困难重重。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社会分裂，反全球化氛围高涨，美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国际经贸合作上有大的突破，政党分裂和特朗普主义的掣肘也会使拜登政府受到很大的限制。在美国经济中，贸易协定议题也历来优先度不高。另外一点是 TPP，美国要想重新加入 TPP 的话，其中的 22 条高标准协定都需要重新谈判，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也会形成一个窗口期，导致美国在重返经贸协定上困难重重。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欧盟和日本与美国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希望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但这两个地区也分别都有自己有限独立的大国抱负，它不一定希望在这个时候和美国推进经贸协定谈判，所以美国在推进贸易协定上困难重重。

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我们总体预期拜登政府在经贸政策上进退维谷，往前走很难，往后退也很难，因为背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势力仍然存在，现阶段对华的最优策略应该是“特规拜随”，特朗普的做法、规则、各种武器都可以拿出来继续用。另外拜登也会

追求有限突破，尤其在结盟方面。在“特规拜随”上，它尤其会注重破坏中国的国际经贸合作的努力，比如中国加入 CPTPP 的努力、中欧全面贸易协定的落实等，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补贴、科技领域也会施压中国，这些都是特朗普政府留下的武器。

美国与盟友协调应对中国的核心，可能不在于贸易，而在科技。美国和它的盟友与中国的贸易仍然是符合其利益的，贸易整体上仍然会有贸易利得，只要他们是理性的，一定会承认这一点。在科技革命的关键时点，科技才是核心竞争冲击，美国与盟友也有优势。在贸易上不一定有优势，但是在科技上这两者都有足够的优势。给定这一点，美国和盟友之间结盟的科技政策可能就更有破坏性和攻击性，因为它的结盟的概率更高，而且也有足够的优势。其政策导向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国产业链去中国化，来保障美国关键产业链的安全，二是中国产业链去美国化，从而把美国有优势的技术从中国产业链剥离出来，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与进步。

拜登政府以劳工为中心的经贸政策和对华关税的两难。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以劳工为中心，这是由美国国内的现状决定的。以劳工为中心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就业，另一个是保护消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与对华关税处在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保护就业，就是要维持关税，维持关税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保护就业，这是最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的。

另外两个不容易被社会所理解的，是意识到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因为关税短期看是保护了相关行业的就业，但它忽视了这个行业上下游带来的一般均衡就业效应，这种上下游的就业受到了关税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关税对就业的保护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对美国尤其如此呢？一是美国制造业比例本身就很低，保护的面很小。二是对华征收关税，有其他的国家自然会来填补中国的出口，这就是贸易的转移效应。这二者一是一般均衡效应，二是贸易转移效应，再加上美国制造业本身的比例低，就决定了美国通过关税来保护就业的这种效果长期来看是很弱的，但是短期来看或者说向社会的解释接受度来看是直接的。所以，短期维持关税是符合美国政治需要的，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长期取决于经济和政治之间考量的博弈，如果是考虑经济的话，关税很有可能会取消，但如果国内政治依然分裂的话，这个关税很可能就不会取消。从保护消费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取消关税的，这可以降低美国劳工阶层面临的消费的价格。国际主流的研究都表明，美国对华关税接近 90%都转移到美国国内，由美国消费者所承担。所以美国以劳工为中心的经贸政策和对华关税，我们认为是存在两难的，但这是有短期

和长期的区分。权衡而言，结合前面我们说的关于科技的分析，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国际战略竞争考虑来看，我们认为综合权衡，很有可能科技产业关税会维持，但消费品的关税可能会逐步取消，中期选举是一个时间节点，在这前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动。

四、中国应对策略

善用当前窗口期的市场规模优势，有的放矢对冲美国策略。短期来看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在疫情预期结束前后的这段时间，各国都有极大的压力来迅速恢复经济，谁能够利用好中国市场，就有可能率先实现复苏。在这个时间点，中国的市场规模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工具。首先是做好自己的改革和开放，这是基本面。市场规模这个工具关键针对三方面来用，一个是针对美国，一个是针对日本，一个针对欧盟，用的思路是两个，一个是离岸平衡，一个是打破美国的合纵，我们说的连横，应当配套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针对美国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唤醒美国国内的理性经济力量，意识到疫后中国市场的价值。为什么这是最关键的呢？不管是哪个国际机构和单个国家，至少在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真正制衡美国，美国政治制度决定了真正制衡美国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国内，这时候要充分利用美国国内的理性力量，用加强经济合作离岸平衡民粹力量。理性力量和民粹力量之间是有冲突的，以前在特朗普时期这两者是类似于麦卡锡主义的，大家不可言说，但现在是可以言说的，这些理性力量可以发声，这是一个关键。中国怎么去做呢？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可以主动作为，比如在经济上可以主动出击来塑造议程，继续扩大开放，主动复活中美 BIT 谈判，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在符合中国利益的点上可以主动表态，比如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做了很多工作，在技术转移上是市场化的，这都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另外一点就是在不同的议题上做交易，断绝美国所谓的“甘蔗两头甜”的幻想。

对于日本和欧盟，要利用市场优势吸引他们加强经济合作，尤其在日本方面，关键议题是 CPTPP，可以用市场规模的优势来吸引日本和各成员国尽快谈定中国加入的事宜。美国和日本的产业是有竞争性的，但中国加入的话和日本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利于巩固日本在亚洲的发展，以及在亚洲产业链上的有利地位。另外，我们可以尽快推动 RCEP 落实生效，来巩固亚洲产业链，紧密亚洲经济联系，保障亚洲产业链的完整。

欧盟方面也是如此，关键还是要抓住大账，让欧盟意识到疫情后中国市场的价值，

尽快落实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欧盟意识到美国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以及特朗普 2024 年可能会重新起来，这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

论坛第二单元，关于“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美国战略只是从特朗普的硬遏制战略、不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向可竞争、可持续的遏制战略进行转变，一方面，美国要在自身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战略遏制；另一方面，美国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中长期的战略遏制，来替代过去全方位、全领域的硬遏制。基于此，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第一，要对短期内实施的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产业影响做出判断。第二，不要因为所谓的窗口期而对美国战略产生一系列的误读，而要对美国战略利益进行深入的解剖。第三，美国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式微以及诸多新战略的不可行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尤其是在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对话机会增多。与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套路不同，拜登的套路会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会更多考虑到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出牌。拜登和特朗普一致的地方就是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带有敌对的态度，这一点没有变化。中国还是应该更加开放，因为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会依照国际惯例，我们也应对相关的国际惯例有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思考怎么去通过运用相应的国际惯例，与欧盟、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另外，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债务问题和资本市场的隐患仍会存在，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即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同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关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主要有三个判断，第一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为热战，尤其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不排除会出现局部冲突，第二是中美脱钩势在必行，第三是拜登政府会利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来对华施加压力。尽管如此，我们现在还是拥有窗口期，第一个是在所谓的西方盟国完成合围之前的窗口期，第二个是美国战略调整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我们不能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因为缓和、合作是为了我国的核心利益。延缓和美国的决战，甚至是避免和美国的决战，对我

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窗口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利益，而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前与对方交战是不利的。我们应当如何争取窗口期呢？首先要彼此要沟通，彼此要关切，另外还要发挥大企业的作用，在民间交流方面我们也应当足够重视。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关于中美经贸冲突未来的演进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想与中国全面脱钩，而在拜登时代美国可能更愿意定向脱钩，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封锁和遏制。第二，和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不同，未来拜登会通过多边主义来围堵中国，中国也会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进行应对，类似我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因此，多边主义会是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词。关于我国的应对措施，我们应注意，在大国博弈中很难谈“理性”，我国要慎提“胡萝卜+大棒”的策略。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经贸领域存在三个潜在的风险点：第一，未来一段时间，关于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提法可能会重新浮出水面。第二，中美金融领域的矛盾在未来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第三，特朗普政府虽然也在打政治牌，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且打政治牌需要盟友的配合，而特朗普实行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缺少盟友的配合，因此特朗普主要是打经济牌，但拜登上台后，大概率会和奥巴马政府一样经济政治牌一起打。

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总体来看特朗普主义还在继续，特别是对华政策，例如虽然拜登在选举的时候曾说会考虑取消关税，但新任美国财长已宣布暂不取消对华关税。在经贸、科技、文化、金融市场等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美国对华政策要走上正轨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努力。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两国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2020 年中国对美出口迎来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目前美国的领导者和包括硅谷、华尔街人士在内的各界精英对中国，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其实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其他领域两国关系挑战重重。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快的，这对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持经常项目大幅顺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非常明智。总之，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巨大的市场基本面其实是维持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压舱石。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

施？专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见解。

毛振华认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但这两点都与“世界工厂”分不开，都涉及到了对外开放。我们在讲中国大市场的时候，就是在讲开放的市场。此外，对外开放中的合规、对于国际惯例的坚守以及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也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当前在科技方面补短板、扩内需，这都是内循环战略实施下的重要内容。面对中美冲突，我们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加速弥补科技方面存在的短板。同时，开放大市场的建立对于国内保增长、化解国际压力都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在建设、投资等供给侧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多，现在我们在需求侧和市场方面也应当加大力度。

李迅雷认为，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扩大内需，一个是加大科技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我国 GDP 中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消费占比又明显偏低，所以要扩大内需，最重要的就是想方设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扩内需就会成为无水之源。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高端消费的增长较快，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明显下降，这是消费升级的表现。我国应把扩内需更多放在中低端消费上，因为中低端消费可以拉动对国内产品的消费，而高端奢侈品的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对国内制造业的升级、对中国产品高端化的进程是不太有利的。所以，一方面，我国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要有所动作，需要增加对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方面的补贴，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社会保障之后能消费、敢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目前缺少一种税收改革来缩小收入差距。2020 年我国已实现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今后要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上还是要加大力度。

张明认为，中国的应对策略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要大力发展以双循环为新发展格局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国内技术自主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新的区域一体化。第二，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贸易领域，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区域化缩短是产业链演变的趋势，我们应该在 RCEP 和“一带一路”领域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在金融领域，要用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拓展人民币计价功能，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 RCEP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在对外开放方面，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前中国 20 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

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自贸港进行不同的试验。第三，我国要积极和美国互动：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虽然要明确对美国博弈的底线，但是同时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

沈建光认为，尽管美国对华进行了关税压制，但中国仍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核心原因还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央提到的以内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经济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怎样培育发展国内市场，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零售总额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商品的第一大制造国，现在也成为零售品的第一大消费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很多做法，相信两会就会有很多讨论，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包括扩大优质产品供应链到县级和农村市场等。从大数据看，目前四五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消费复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中国的内需提升还是有巨大的空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等很多领域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次疫情防控中，包括金融科技、移动支付和广泛推广中的数字人民币在内的数字经济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各个城市目前也都在做智慧城市项目，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缺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今后的两国博弈中，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格局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刘青认为，不管是对美国、欧洲还是对日本，市场规模的优势其实是讲市场的力量，大家能够从市场交易、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这是始终要把握的大方向。另外一个讲到的是胡萝卜+大棒，当然可以不这么说，但是中国以前很被动的一点就是始终处于守势，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包括在所谓的卡脖子技术这一点上，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防守型的思维方式，但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完全完整的技术从而不被别国卡脖子，之所以有的国家不怕被卡脖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自己独有的尖端技术，这样就会有反制的技术和力量，达成平衡，均衡的结果就是相互合作，互不卡脖子。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出这样独有的技术，哪怕我们现在可能被别人卡脖子，但如果我们也有自己反制的技术，那么这种被卡脖子的风险就会低很多，因此我们在技术上也应该有以攻为守的思维方式，要更进取一些，真正通过基础创新取得一些尖端创新，而不完全是被动的防御性思维。

刘元春：不要误读所谓窗口期，“可控的新遏制战略”是拜登政府的核心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上的发言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最近美国出台的 1.9 万亿美元新一轮刺激计划引发了各界热烈讨论，大家普遍关注这项政策对于世界金融市场、全球通货膨胀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这类讨论短期来看热度很高，但从中期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如何定位依然是问题的关键。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各类团队进行了很多深入研究，人民大学团队对中美贸易第一轮协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对今年的实施情况进行展望。核心关注点在于，在双边对去年中美经贸协定执行过程进行评估之后，各自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大部分团队对于美国政策调整的判断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拜登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二是拜登内阁的各位关键人物在国会做出的证词；三是刚刚颁布的《临时国安战略指导》。这 3 个方面当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延续，这几大因素是我们在展望新一轮谈判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首先需要理清的 2021 年执行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定的贸易额及其影响。2021 年相对于 2017 年基期所要额外增长的贸易总量要达到 2000 亿美金。2020 年中国自美国总进口规模不到 1000 亿美元，虽然双方对于承诺完成程度的测算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完成。如果这些额度要延续到今年，那么今年承诺购买的额外协议金额可能会接近 1000 亿美元，年度总购买额度可能会超过 2000 亿美元。分行业来看，农业要达到 400 亿美金，制造业要达到 1100 亿美金，能源要达到 4150 亿美金，尽管在整个进口中的占比并不大，但我们仍然需要评估这会对具体行业产生怎样的冲击。

其次要理清美国对于去年中美贸易执行状况的态度。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和美国白宫预算局等机构都对去年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基本都认为特朗普贸易霸凌主义的做法对于美国利益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尤其是关税成本转嫁问题、供应链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美国企业在华利益问题等，这些评估结果可能会成为促成当政者调整协议、再评估协议和进行第二阶段协议谈判的基本参考资料。当然，

单纯从这些角度来对拜登政府在中美贸易协定中出现的变化动向作出判断是不够充分的。究其原因，第一，在美国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特朗普时期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政治路径依赖和法规路径依赖，锁定了中美在短期内的部分行为模式。第二，拜登政府的执政思路并非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反特朗普主义，而是反特朗普主义中不可持续、不符合美国整体利益的部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并不是简单的反特朗普主义，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更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从“硬遏制战略”向“竞合战略”转变。从最近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国会上的证词和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拜登政府认为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是否取消关税将成为美国下一轮谈判的重要砝码。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美国战略并不会因为短期的政治波动而改变。

第三，我们要从更深层次看待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本质，不要产生“幻觉”性的误读。美国对华战略只是从特朗普的硬遏制战略、不可持续的遏制战略向可竞争、可持续的遏制战略进行转变。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要在自身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基础上展开战略遏制。其次，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中长期的战略遏制，以替代过去不可持续的全方位、全领域、拘于一役的硬遏制，最明显的是美国目前在技术上的遏制力度可能会比特朗普时代更加严峻，最近日本、澳大利亚、欧洲已经对一系列技术问题提出了严重关切，并且积极向美国进行靠拢，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西方阵营技术转让协议可能会在现在出现新的版本。尽管上述关键领域和实质性领域的遏制不可避免，第三、非关键领域的合作和竞争虽然会出现，但都是基于美国战略竞争力重构为基础，只是为美国新的产业链和国际体系再造提供战略调整期。因此，拜登政府提出的“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遏制就遏制”新战略构想在本质上既不是精准也不是合作，而是长期可持续、可控的新遏制战略。它一方面会在部分领域采取“新接触战略”，扬弃传统民主党提出的“接触-松动-崩溃”，要求中国按照美国设定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来参与美国世界在新时期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会在竞争中消耗中国的实力，寻找中国的短板。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必将在各类关键领域采取更为强劲和更可持续的遏制手段，全面遏制中国竞争力快速提升的势头。部分领域阶段性的调和与合作在近期必将出现，但其归根结底是要落脚到全面遏制上面来。因此，很多人认为拜登当选将给中国一个喘气的“窗口期”，这是一个错觉。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美国政府战略调整给我们带来

的新机会，但不等于我们的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的压力有所减少。

基于此，第一，我们要对短期内实施的协议可能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微观产业影响作出判断。第二，不要因为所谓的窗口期而对美国战略产生一系列的误读，而要对美国战略利益进行深入的解剖。第三，美国国内政策所引发的国际地位下降、国际战略式微以及诸多新战略的不可持续等问题，是下一步我们要把握的关键点，尤其是在金融、货币、债务等领域，不能简单就国际战略谈战略。

李迅雷：扩大对外开放进程，维持资本市场稳定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李迅雷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上的发言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我主要的一个判断是拜登上台后，我国和拜登对话的机会更多了。和特朗普“简单粗暴”的套路不同，拜登的套路会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会更多考虑到国际游戏规则、按照国际惯例出牌。而拜登和特朗普一致的地方就是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甚至是带有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点没有变化。但好的地方在于特朗普采取了“退群”策略，从各种国际组织退出，中国则是在积极“入群”，无论是 RCEP 还是中欧投资协定等。但拜登上台之后可能还会采取“建新群”的方式，使中国相对孤立，阻碍中国和其他经济体进行更多的合作，这是他的意图。故中国还是应该更加开放，因为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会依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我们应对相关的国际惯例有更加深入的学习和理解，思考怎么去运用国际惯例来以牙还牙，与欧盟、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更加紧密的投资与贸易合作。

实际上，中美之间在贸易领域更多是互补性的关系。从经济互利的角度来讲，中美之间应该有更多的合作，产生更多的交易，彼此之间的贸易规模应该更大。实际上去年我国出口还是不错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份额又增加了两个百分点，说明特朗普采取的一系列加征关税、阻断来自中国的进口的举措是失败的，两国最大的需求还是来自于企业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合作。今年两国贸易的前景仍是乐观的，因为美国为了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推出了诸多刺激政策，比如刚刚推出的 1.9 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这种财政刺激有 1 万亿美元补贴给居民部门，有 5000 亿美元补贴给企业部门，另外 4000 亿美元作为对当前疫情控制的投入，这虽会增加美国的债务，但客观上来讲又拉动了需求，所以去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负增长，而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却是正增长，这也是在疫情之下各部门获得大量政府补助才有的结果。

鉴于此，我认为我国应在对美开放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和美国的经贸合作，从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保要求以及加大对美国相关贸易品进口规模在内的诸多方面来运作。正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是互补关系，我国在这些方面做出的一些让

步，其实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也符合我国的贸易利益，因为我国本身对美国很多商品也有进口需求，且去年我国在外贸顺差上还创下了一个历史高点。

今年我国还是要加大出口力度。按照一般的预期，中国今年的出口走势可能是前高后低，去年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比较大，达到 28%，今年出口的贡献度可能会下降，但出口增速还会继续上升，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竞争力是有利的。从经贸角度而言，应当把握拜登上台的机遇，继续加大开放的力度，继续把中国制造业纳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中。

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拜登新政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对资本市场也会带来相应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会传导到中国。中国如何来评估和应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比如上周，市场热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显著上升对股市的影响，这一周以来国债收益率又有所回落，如何评估这个现象？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际上已对我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了显著影响，我国应该努力降低这种负面影响，例如今年美国股市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的股市经过了 12 年的牛市之后，在当前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存在什么样的风险，这需要管理层做好评估和预案。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确出现了流动性拐点；在房地产市场“房住不炒”的背景下，房贷利率也有所上升。如果在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出现了大幅下跌，我国的货币政策要继续收紧还是要放松？我倾向于能够适度放松，让流动性能够缓和一些，让利率水平能够维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对于美国而言，虽然经济在复苏，但就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美国目前的利率走势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现背离，一方面货币政策在放水，另一方面它的利率水平却在上行，这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在目前国内普遍的预期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显著上升。美国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有很大的定价权，但大部分大宗商品的消费市场都在中国，如中国对于铜、铝、铁矿石、镍等大宗商品的消费量达到全球的一半，而美国的占比却并不大，因此在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的市场预期下，我国要在舆论和政策上做好稳定预期和引导，否则若美国经济复苏本身带来的需求不大，但在金融机构的炒作下，大宗商品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需要采取相应的举措来平缓目前 PPI 的上涨。虽然我不认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可持续的，但如果出现恶性的炒作的话，对于我国的经济，特别是资本市场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的债务问题和资本市场的隐患仍会存在，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有相应的预案，即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进行调整，以应对不同风险事件的可能爆发。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两个支撑点，一个是扩内需，一个是加大科技投入拉动中国经济的产业转型升级。

扩大内需讲了很多年，但效果到底如何？到今年年底内需能否被有效地拉动起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我国有几项指标似乎是低于预期的，比如 2017 年前市场对于投资很有信心，投资增速都保持较高水平；但 2017 年后，投资增速在逐步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资，近几年来基建投资增速要低于市场预期，这可能也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有关：受制于债务的影响，地方政府有投资的动力，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另一方面也受制于项目的影响，在意图通过基建来拉动扩内需的时候，是否有好的项目，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如何，辐射效应、对于产业链的拉动作用如何，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已在我国持续了很长时间，即使剔除去年的特殊情况，按照支出法来计算，资本形成占我国 GDP 的比重仍在 35%左右，高于全世界 21%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 GDP 中投资占比明显偏高，而消费占比又明显偏低。所以还是要想方设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收入不增加，扩内需就成为无源之水了，因此还是要有相应的举措来增加居民收入。

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在消费领域，高端消费的增长比较快，如高级香烟、高端白酒的消费趋势都在上行，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明显下降，这是可能也是消费升级的表现，但更多是因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我国应把扩内需更多放在中低端消费上，因为中低端消费更能拉动对国内商品的增长，而高端奢侈品的消费相当一部分是对海外奢侈品的消费，对国内制造业的升级、对中国产品高端化的进程贡献不大。所以一方面，我国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要有改革举措，需要增加对于社会保障如养老、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补贴，让中低收入阶层有了社会保障之后能消费、敢消费；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目前缺少强有力的税收改革举措来缩小收入差距，此外还要加强第三次分配，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2020 年我国已实现

了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目标，今后要走向共同富裕，在改革上还是要加大力度。

毛振华：把握中美关系窗口期，不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上的发言

分析拜登对华政策，我想从这么一个角度来讨论：一是在疫情冲击下，中美关系出现了哪些新情况？二是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又有哪些新情况？然后根据这些新情况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做一个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关注疫情冲击及拜登上台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的新情况

2020 年新冠疫情是意料之外的新情况，是 2018 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战时所看不到的。疫情的出现对特朗普政府来说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在很大程度来讲，他的大选失败和疫情也有关系。疫情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具体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疫情增大了美国的压力。2018 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有着广泛的背景，此前在中美民间智库的交流中，我发现对中国进行遏制在美国两党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焦虑，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 GDP 占美国的比重已经超过 70%，这将给美国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二是在疫情早期，特朗普政府做了一个所谓和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武汉地区刚刚暴发疫情的时候，美国迫不及待地实施了与中国断航、撤侨、撤大使馆等一系列措施。在欧洲各国先后暴发疫情的时候，美国内部也没有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唯独对中国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所以，我认为美国是在进行所谓的中美脱钩压力测试，观察在中美之间没有人流、物流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并且要把这种压力测试的结果展示给自己的盟友乃至全世界，试图证明即使与中国缺少往来，对美国自身影响也不大。

三是疫情下的贸易战并没有改变中美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出口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甚至在部分领域、部分产品上还有所增长，中美贸易逆差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所以说，只要美国仍然保持市场化的经济体系，那么它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十分密切的。

从美国政府更替的角度来看，在拜登上台、民主党执政的背景下，也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毕竟换了政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拜登政府仍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 “遗产”框架下形成的对华政策。在两党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特朗普的思想、特朗普主义成为一个“遗产”，正如刘青教授所讲的“特规拜随”。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很多规则，也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的态度，并且延续了关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尽管拜登是建制派，希望在某种规则下进行运作，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或放松特朗普时期的做法。

其次，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意识进一步增强，原来叫做竞争，现在定位为“激烈竞争”，也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将对华强硬派、反中派都汇聚在民主党的体系内。

再次，拜登在各大多边机构都强调美国的归来，要重新走传统建制派的路子。除了重返 WHO 是为了应对疫情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为了中长期问题。拜登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游说盟国，迫不及待要成为反中联盟的领袖，这与特朗普政府的“单兵独进”有很大区别，所以说拜登政府更有章法，在反中联盟中拥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增加新的对中国的所谓制裁，表面上看紧张的格局有所缓和，一些非规则性的极限施压还可能继续调整。

二、中美脱钩势在必行，抓住窗口期推动缓和与合作

以上是我们看到的自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及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新情况。通过这些新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些端倪。从 2018 年起我一直在持续观察中美关系走势，提出了中美贸易战演变的“三部曲”，当时不少人认为我的说法有点过，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现在回头来看，中美关系的演变基本上跟我当时的判断差不多。结合我之前的观点和现在观察到的新情况，关于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我主要有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为热战，尤其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中美都是拥核大国，不会在本土发生战争，但是不会排除会出现局部冲突。中美或许会以一场小规模的热战奠定中美完全脱钩的基础，形成新冷战格局，小冷战演变成大冷战，甚至小热战演变成大热战，这是有可能的，但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

第二个判断是中美脱钩势在必行。经济脱钩方面，拜登比特朗普更有弹性，更有取舍空间。针对美国所谓的经济利益，拜登政府会更加理性。正如刘青教授所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还是科技的竞争。中国的发展之所以让美国倍感压力，除了经济总量之外，

更重要的经济总量背后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科技产品、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中国的科技发展态势，这对美国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所以说，中美脱钩应该是一个长期趋势。

第三个判断是拜登政府会利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来对华施加压力。这在美国方面属于阳谋。对我们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合理破解。

尽管如此，我们现在仍拥有窗口期。第一个窗口期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完成合围之前的窗口期。拜登的目标是实现完全合围，当然能否实现合围，要看我们如何破阵，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一天就完成的。因此，不同于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拜登对华实现合围存在一个时间段，这就是我们的窗口期。第二个窗口期是美国战略调整窗口期。美国在全世界进行战略调整，这种调整旨在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但需要时间，这个窗口期缓和了中美极限施压下的紧张格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在窗口期内，我们不能放弃缓和、合作的机会，因为缓和与合作是为了我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比美国发展更快，如果不受到较大干扰，我们的经济总量可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就超过美国。延缓和美国的决战，甚至是避免和美国的决战，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窗口期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利益，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提前与对方交战是不利的。

我们应当如何争取窗口期呢？

一是，彼此要沟通，明确彼此的关切和底线。不仅要让对方明白我们的关切和底线，也要了解对方的关切和底线。不必事事处处针尖对麦芒，要有所进，也要有所退、有所保留。至少要暂缓一些在过去容易引起美方等西方国家误读的行动，尤其是在一些对中国来说属于非核心利益的领域更是要如此。

二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要注意避免被误读。西方社会普遍对中国存在误读，认为中国构建人类共同体就是意图对外输出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行动，也要充分考虑到可能被误读导致的影响，在一些非核心利益的领域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要发挥大型跨国企业的作用。1989-1992 年中国遇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然而当时美国的商界和学术界还是有很多人帮中国说话，在国会听证会上为中国发声，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所以我们要通过扩大开放努力发挥大型跨国企业的作用。

另外，在民间交流方面我们也应当有所着力，从而让我们的盟友越来越多。

三、面对中美“科技脱钩”，仍需坚持对外开放

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但这两点都与“世界工厂”分不开，都涉及到了对外开放。我们在讲中国大市场的时候，就是在讲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市场对于内循环的作用很大，但我们不能对国内大市场在对外经贸关系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太过于乐观。去年中国消费出现负增长，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消费是正增长的，这与各国国内疫情下的应对政策有关系，西方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都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特别是直接给居民发放补贴，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资金运用到扩大消费市场上。消费市场的扩大主要着眼于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消费能力的核心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我们的刺激方案主要是把资金投放于政府能够掌控的投资项目上，尽管中国市场本身规模不小，但是近两年来总规模存在着紧缩的态势。

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在中美冲突中不再为中国说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缺乏优势，很难从中国市场上赚到钱。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自身快速成长起来，在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上，中国消费者更多选择中国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壁垒，当然这种壁垒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是广泛存在的。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在全世界盛行，对外开放也是相互的，所以我们加大对外开放也应当是有限度的。

对外开放中的合规、对于国际惯例的坚守以及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当前在科技方面补短板、扩内需，这都是内循环战略实施下的重要内容。面对中美冲突，我们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扩大国内需求，同时加速弥补科技方面存在的短板。同时，开放市场的建立对于国内保增长、化解国际压力都是很有必要的，过去我们在建设、投资等供给侧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现在我们在需求侧和市场方面也应当加大力度。

张明：中美经贸领域的三大潜在风险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张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上的发言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对中美经贸冲突未来演进趋势的判断，有两点非常重要：

第一，特朗普时代美国政府试图实现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而拜登时代美国更可能追求与中国的定向脱钩，也即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

第二，和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举措不同，未来拜登政府更可能通过多边主义举措来遏制中国，而中国政府也很可能会采取多边主义举措来进行应对。中美博弈有些类似我国战国时期的大国之间的“合纵”与“连横”。换言之，多边主义会是未来中美博弈的关键词。

对我国的应对措施而言，有两点也很重要：

第一，在大国博弈中很难谈“理性”。对美国精英阶层而言，在下一阶段，很难说和中国密切合作是更“理性”呢？还是对中国进行特定遏制是更“理性”呢？在国家利益面前，很可能立场不一样，“理性”这个词的定义也不一样。

第二，“胡萝卜+大棒”的策略中国政府还是要慎提。以前各国对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批评就是，外交方面动不动就是“胡萝卜+大棒”，听话就给利益，不听话就施压。未来在经济外交方面，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要讲情怀，在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考虑各种其他诉求，例如意识形态、公共产品、全球关怀等。在明面上要做到各种策略并重，不要过分强调经济利益，虽然各种策略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个人认为，中美经贸领域存在三个潜在风险点：

第一，关于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和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提法可能重新浮出水面。在 2020 年新冠疫情冲击下，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出口不降反升，以至于去年中国的经常帐户顺差创下多年来新高。

而在 1.9 万亿美元的新财政刺激投放后，今年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大概率会进一步扩大。因此，不排除美国政客重新利用中美经常帐户失衡做文章，例如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等，通过上述手段来要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针对

这样的可能性，我国政府对此应该提前做好预判与准备。此外，美国政府还可能把贸易问题和金融问题联系起来，比如在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基础上，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对美资金融机构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我国政府对此也应做好准备与预案。

第二，中美金融领域的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的可能性。这里我有三点思考。其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强硬地要求部分中概股从美国股票市场退市，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在拜登上台后，上述趋势并没有改变。如果未来美国政府继续对中概股实施严格的审查和刁难，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需要系统思考。其二，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领域的审查继续保持严格打压态势，美国政府会继续发挥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CFIUS）的作用，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企业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其三，新冠疫情后，美国政府花了巨大成本稳定市场与提振经济，例如扩张财政政策的规模前所未有，由此产生了一种风险，即美国政府会像过去一样，通过特定方式把其庞大的政策成本让其他国家来分担，而中国投资者很可能会分担其部分成本。

当前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 1.4%，而中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 3.3%，中间存在近 200 个基点的息差，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去年升值超过 6%。如果美国投资者向中国投资者卖出 10 年期美国国债，并从中国投资者手里买入 10 年期中国国债，那么美国投资者可以获益超 8%，这还没有考虑加杠杆。换言之，在当前形势下，如果鼓励中国投资者加大海外证券投资力度，他们大概率会买入大量美国国债，这些资金如果被美国金融机构反过来用来买入我国国债的话，美国人就能获得息差加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收益。上述交易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国民财富的损失，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帮助美国政府承担了部分救市成本。

第三，拜登政府将会把经济与政治两手牌一起打。特朗普政府虽然也在打政治牌，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此外，打政治牌需要盟友配合，而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单边主义外交策略很难获得盟友的配合。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大概率会和奥巴马政府一样，把经济牌与政治牌一起打。在奥巴马时期，中美博弈带给中国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经济领域，而是来自地缘政治和多边领域，这一情况可能会重演。因此，美国政府可能会拿中国的一些敏感地区的“人权”问题大做文章，也可能在中国周边一

些地缘热点区域兴风作浪。美国政府会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融合，团结盟友一起向中国施压。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呢？美国政府通过多边主义施压，我国政府也一定要以多边主义来应对。在这个方面应该有一套系统策略，应该用透明度更高的、市场化更强的、国际社会更能理解的一系列策略和方式进行应对，对此要做好充分准备。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中国的应对策略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要努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套以我为主、兼顾内外的系统发展策略。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消费扩大和消费升级，这背后最重要的是持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自主创新；三是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这三大支柱如果得到妥善解决，就能顺利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从贸易层面来看，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变化，例如区域化与周边化。基于上述趋势，中国政府应该努力在 RCEP 和“一带一路”区域内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产业链。从金融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应该通过新的策略来推进人民币一体化，例如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功能、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着力在 RCEP 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对于人民币的黏性和真实需求等。从开放层面来看，下一步要把目前中国 20 个左右的省级自贸区、自贸港做实做细，要让这些自贸区、自贸港的开放各具特色，不要千篇一律，可以在不同的自贸区进行不同的政策试验。

第二，中国政府依然要高举多边主义的大旗。首先，如果认为中美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趋势，那么未来怎样发展和欧盟、英国、日韩、澳新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将是重中之重，如何与各国发展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其次，不要忘记我国依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政府依然应该充当新兴市场国家的旗手和代言人。

第三，我国要积极主动地和美国沟通、交流与互动。双边博弈是一回事，互利发展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个领域有三点很重要：一是要着力在美国发展对华友好的力量。这些力量曾经是美国的大企业、大金融机构与科研学术界，但在特朗普上台后被明显削弱了。因此，要努力发展能够理解中国的、对华友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穿越美国大

选的政治周期的，未来无论是谁上任，都可以持续发挥作用的；二是一方面要明确与美国博弈的底线，但另一方面手里也要有一些砝码。底线是寸步不让的，但特定砝码在某些时候是可以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三是要形成一个与美国博弈的整体策略。前段时间在一个会议上，我听到的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话让人印象深刻：美国对华是大战略，而我国迄今为止应对美国的策略基本上见招拆招，是被动防守。我国亟须形成一套和美国长期博弈的大战略。用大战略应对大战略，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沈建光：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沈建光　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沈建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 22 期）上的发言

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拜登时期中美经贸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虽然特朗普已经下台，但总体来看特朗普主义还在继续，特别是对华政策。例如虽然拜登在选举的时候曾说会考虑取消关税，但新任美国财长已宣布暂不取消对华关税。看起来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还在延续，这些对华政策对中国的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在经贸、科技、文化、金融市场等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等领域，美国对华政策要走上正轨可能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在经贸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两国关系仍是非常紧密的。尽管自特朗普时期至今，美国对华施加了关税和其他一些不友好的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对美的出口在去年迎来非常强劲的增长，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而且反超了欧盟和加拿大。这是出人意料的，也确实反映了经济基本面重要的作用，尽管存在对华打压政策，但美国的消费者、工厂厂家、华尔街、硅谷对中国产品和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仍非常高，而不是仅靠政客的态度就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去年第四季度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额基本上都增长了 30-40%，在 11 月份甚至接近 50%，其中不光是抗疫用品，电子产品、家具、化学工业半成品的出口也在飞速增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在疫情下中国恢复生产的速度较快，而消费的恢复相对没有那么快，造成了一个供大于求的局面。而可以看到美国的抗疫措施主要施加在就业者身上，在居民身上发放现金和支票，美国的个人收入在疫情期间反而大幅增长，储蓄总额创历史新高，说明美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主要是受到财政刺激的影响。美国的消费增长也很强劲，消费水平基本上已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增速甚至还要更快，但美国的生产受疫情影响较大，因此其面临的问题是供小于求，存在一个供需缺口，中国的产品恰好填补了这样一个缺口。不光在美国，在日本和欧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中国产品的出口表现非常强劲，这对其他国家居民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巨大的贡献作用，其他国家饱受疫情所困，生产能力受到影响，而中国生产能力的恢复是全球最好的，中国是世界最后的

商品提供国。

经济基本面在中美关系中仍起到决定性作用，美国仍在大量进口中国的商品。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上行，这种环境下美联储继续实行零利率的宽松政策比较困难。因此美国财长鲍威尔一直强调，尽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约为 6%，但是对于通胀问题不用太担心。这里“不用太担心”的很大原因是美国大量进口了中国的商品。最新研究发现，美国从各国进口的商品中，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上升速度是最慢的，去年只上升了 1%，而美国从近邻加拿大进口的商品价格上升了 9.5%，从欧盟、墨西哥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价格上升均在 2-3%之间。这是美国遏制通胀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它存在输入型通胀，那么从中国输入的通胀其实是最小的，中国又是美国目前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这对美国遏制通胀压力其实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美国的领导者和包括硅谷、华尔街人士在内的各界精英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态度其实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个压舱石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其他领域两国关系仍挑战重重。

总体来看，两国经贸关系中美国是巨大的获利方，中国当然也是。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考虑到中国的出口情况，美国市场对中国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是所有国家当中最快的，这对我国解决就业问题和维持经常项目大幅顺差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基础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非常明智。即使在贸易制裁下，中国还是高举开放的大旗，吸引美国的特斯拉、雪佛龙等大型企业投资中国，一些金融企业也加大对华投资，这把压舱石做得更夯实了。去年全球各国的 FDI 都大幅下降，只有到中国的 FDI 在上升，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全球很多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额都下降了 30%左右，中国却上升了近 5%。这说明只要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有最完备的产能，只要我们坚持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些政治上的干扰就很难动摇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

从我国近期的外贸形势、从 FDI、从全球投资者积极向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投资的现象，可以看到我国的对外开放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海外资金。特别是目前，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少数正利率，且利率相对比较高的国家，国债收益率达到 3%以上，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率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国会继续成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资金目的地。

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有压力的。未来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关键的。虽然目前人民币要与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平起平坐尚需相当长的距离，但人民币要达到 SDR 权重中占比 10%的这样一个重要地位，靠我们的自身努力还是做得到的。

过去我国因担心人民币贬值而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鼓励资金流入，对流出管控非常严。在新的环境下，可以考虑双边开放，货币流进流出可以考虑一视同仁，让汇率更加自由地浮动，这样也可以鼓励人民币走出去，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在这方面外管局最近有一些动作，如宣布正在研究居民进行海外投资的限额为 5 万美元，这样的考量是非常正确的。

总之，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巨大的市场基本面其实是维持中美关系最好的一个压舱石。

面对中美未来的“科技脱钩”及多边主义冲突两大趋势，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尽管美国对华进行了关税压制，中国仍反超美国的其他两个贸易伙伴，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其实核心原因还是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央提到的以内循环为基础的双循环经济是非常正确的。我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怎样培育发展国内市场，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通过计算可知，去年 10-12 月份，即使按照美元计价，中国零售总额也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单月零售国，当然全年来看还是美国第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商品的第一大制造国，现在也成为零售品的第一大消费国，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很多做法，相信两会就会有很多讨论，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包括扩大优质产品供应链到县级和农村市场等。从大数据看，目前四五线城市、县城和农村的消费复苏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中国的内需提升还是有巨大的空间。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数字经济等很多领域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次疫情防控中，包括金融科技、移动支付和广泛推广中的数字人民币在内的数字经济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各个城市目前也都在做智慧城市项目，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缺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在今后的两国博弈中，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格局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崇德楼西楼9层
Add: 9th Floor, West Wing of Chong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